

生态人类学研究丛书

生态人类学 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杨庭硕 等 / 著

民族出版社

53
.1

生态人类学研究丛书

生态人类学导论

杨庭硕等/著

民族出版社

Q988-53

Y286.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态人类学导论/杨庭硕等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5

(生态人类学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105 - 08288 - 9

I. 生... II. 杨... III. 人类生态学 IV. Q9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6615 号



生态人类学导论

著 者: 杨庭硕等

丛书策划: 倩 男

责任编辑: 龚黔兰

封面设计: 吾 要

责任印制: 石小娟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58130038 (编辑室)

010-64224782 (发行部)

<http://www.mzchs.com>

投稿邮箱: gongqianlan@sina.com

印 刷: 迪鑫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46 千字

印 张: 8.625

印 数: 3000 册

定 价: 19.80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105 - 08288 - 9/C·213 (汉 192)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吉首大学民族学重点学科与民族学研究基地
怀化学院湖南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

联合推出

《生态人类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杨庭硕 罗康隆

成 员 游 俊 龙先琼 阳柏苏

陈东明 吕永锋 刘 翀

余朝文 刘世彪

AN INTRODUCTION TO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前 言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不是一本个人专著，而是集体智慧的产物。我自2000年起就着手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工作，当时是围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利用文化制衡原理控制水土流失的可行性研究，开展人为生态灾变的探讨，有幸的是，得到了众多合作者的认同和支持。于是，在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同时，草拟了一份有关生态人类学的研究生教学大纲。随后，还用这个教学大纲在国内外7所大学作过演讲，并就这一教学大纲在吉首大学给三个年级的研究生作过讲授，并因此而争取到十多位支持者和合作者。他们和我一道经历了整整4年时间，八易其稿，才写成这部小册子。书稿写成后，连我自己都意识到，书中的很多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理解和认识，这都来自于合作者和支持者的贡献。本书出版之际，谨向这些支持者和合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参加本书初稿编写工作的合作者有吕永锋、杜薇、邢启顺、吴正彪，参加本书历次修改的合作者还有麻勇恒、翟玉前、陆永刚、罗康智、毛家艳，此外，田红、麻春霞、谭卫华、滕晓华、吴新禄、粟应人，分别承担了一至三章的修改任务。全书基本修订后，又由杜薇和翟玉前作了全书通撰和校对。本书虽是一个小册子，但却汇聚了众多人员的心血和智慧。遗憾的是，我个人视力太差，没有能力亲自校勘润色，致使书中错讹之处在所难免，论述不当之处也一定不少，错讹和不足因我而起，理应由我负责。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过张海洋、尹绍亭、崔延虎、贾仲益等同仁的支持和赐教，出版时又得到了吉首大学和贵州大学的资助，得到责任编辑龚黔兰的支持，在此一一致谢。

本书虽已问世，但在笔者看来，这仅是一份有待进一步修改的稿本。并非笔者诚心滥竽充数，而是因为生态人类学是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理论有

待完善，诸多概念亟待澄清，而国内外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又极其薄弱，若不及时提供一个稿本，充当批评指正的靶子，就很难将研究引向深入。因此，笔者甘冒被学界指斥的风险，将自己都觉得还不太满意的书稿推出，聊充引玉之砖，恳请海内外贤达批评斧正。

杨庭硕

2006年9月9日

总 序

20 世纪是人为生态灾变频繁发生的时代，也是全球生态环境明显恶化的时代。生态恶化严重地阻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迫使世人密切关注生态环境的动向，生态学随之成为一门显学。与此同时，众多的学科都纷纷向生态学靠拢，孕育出了一大批新兴的分支学科。在这些边缘学科和分支学科中，生态人类学是一个迟到者，原因在于，现行学科体系习惯于将文化人类学理解为致力于研究非主流社会的学科，理解为以文化为研究单元的描述性学科。习惯使然，不少文化人类学家也忽视对人类生态问题的探讨，自斯图尔德提出文化生态学以来，旁观者较多，热心的支持者和参与者甚少。直到生态问题激化后，文化人类学工作者才为之猛醒。仓促之间，理论建构和术语规范都显得跟不上时代的需要。生态人类学从提出以来，一直徘徊不前，学科发展滞后也就毋庸讳言了。

综观生态人类学近年来的研究，不难发现，其间明显存在着三大不足。其一，过分依赖共时态田野资料，不同程度地忽视历史资料的价值。生态的蜕变，必然是长期积淀的后果。若不从历时的角度审视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演化，审视生态环境的可积累变化趋势，人为生态灾变的成因也就无从发现。从斯图尔德到内亨，尽管都注意到了历时性研究的必要性，然而，由于很多研究对象的历史记载经常残缺错乱，难以充当可凭的依据，加上文化人类学的传统又过分偏爱共时态研究，这就使得近年来国外的生态人类学研究，过分依赖田野调查资料，而不同程度地忽视历史记载的价值，形成的结论不免显得苍白无力。其二，过分夸大个人意识、个人行为的生态作用，不同程度地忽视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的生态行为及其后果的价值。不同民族文化所处生态系统所蕴含的生命物质、生物能极其庞大，社会个人的力量无法与之相比，生态问题的酿成理当是社会合力持续运作的产物。但国外的生态人



类学家受研究传统的熏陶,不免过分地彰显个人的作用,迷信强制手段的作用,忽视社会意识和社会合力在生态维护中的价值。因而,他们断言公共资源的存在是一个悲剧,也就不足为怪了。事实上,由文化维系起来的人群,其社会合力对人为生态灾变的酿成关系更为直接。仅仅由于当事者受到特定文化的模塑,对文化适应不免缺乏自觉,从而导致众多的人为生态灾变都是在无意识中,或者在眼前功利的掩盖下潜滋暗长。忽视各民族生态行为及其生态后果的差异,自然不容易发现人为生态灾变的真实成因。其三,过分热衷于单一民族的生态问题研究,忽视了多元文化并存格局在人类社会中更具普遍性,而这恰恰是探讨人为生态灾变成因的关键之所在。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具有能动适应于所处生态环境的禀赋,也有维护自身独立稳态延续的永恒需求。人类社会的存在,对生态环境来说,必然具有双重性,既有依赖的一面,又有偏离的一面。两者在正常状况下,总是相互耦合,但受到异民族的扰动时,情况就不同了。文化冲突与抗争,必然被推到关系民族存亡的首位,文化与所处生态环境和谐关系的解体,必然会以人为生态灾变的形式爆发出来。人为生态灾变的发生与并存民族间的关系是否和谐,其关联性更为直接。然而,目前国内外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大都忽视了对并存民族文化间关系的分析,忽视了并存民族社会合运动对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这才使得诸多救治人为生态灾变的对策流于浮泛,缺乏可操作性。

对补救业已暴露的生态人类学研究的缺陷,使该学科得以健康地成长,我们充满了自信。这不是来源于我们的能力和智慧,而是因为我们置身于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之中,各民族文化典籍浩瀚,我们拥有的历史资料,足以支持我们对人类生态问题作历时性的回顾和剖析,从文化适应史的角度探寻隐而不显的人为生态灾变成因。中华民族的先哲们高度重视“天人合一”,充分尊重人与自然的协调互动,一贯倡导“中庸”、“合适”,这些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精神瑰宝,赋予了我们聪明才智,使我们能够看到西方人类学家不容易发现的生态哲理和自然哲理。更因为中国长期并行延续的多元文化格局能为我们提供极其生动的多民族综合生态行为及其运行后果的实例,从而使我们的理论建构获得了有利的跨文化资料实证。只要我们做好文化人类学的本土化工作,对国外的生态人类学研究扬长避短,中国的生态人类学终究有一天会跻身世界的前列。



作为一种大胆的尝试，我们在这套丛书中，将向学界推介文化制衡理念，并凭借这种莫基于前人研究的思想，作为破解人为生态灾变成因的有力武器。希望利用文化正常运行的方式，去缓解乃至消除已经露头的人为生态灾变。为此，本丛书将由如下三个方面的著作组成：理论著作、专题研究、个案研究。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完善与健全中国的生态人类学理论，并提供一套可行的生态建设方略。谨以此作为迎接 2008 年在昆明召开的国际人类学大会的献礼，以期就正于海内外贤达。

杨庭硕

2006 年 8 月于吉首大学

目 录

前 言 / 1

总 序 / 1

第一章 地球生命体系与人类 / 1

第二章 人类种群与人类社群 / 6

第三章 随机单元与自为体系 / 11

第四章 平衡持续与稳态延续 / 16

第五章 制衡运行与制衡聚合 / 21

第六章 反馈非对称法则 / 28

第七章 生命信息与人为信息 / 35

第八章 民族文化与民族生境 / 41

第九章 生物制衡与文化制衡 / 46

第十章 生物多样与文化多元 / 52

第十一章	文化建构的双重性	/58
第十二章	生物适应与文化适应	/65
第十三章	文化适应的双向性	/73
第十四章	能动适应与被动偏离	/79
第十五章	偏离的扩大与叠加	/85
第十六章	地方性生态知识的建构及其特点	/91
第十七章	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	/98
第十八章	地方性生态知识的发掘与利用	/105
第十九章	生态人类学与生态安全	/112
第二十章	生态人类学与生态灾变	/120
后 记		/127

第一章 地球生命体系与人类

地球生命体系——人类社会——寄生性存在——生态隐忧——生态人类学三大立论公设——超大尺度——民族文化——制衡法则

地球生命体系的发生、发展、延续和演替，有赖于地球表面一系列无机环境特征的存在。正是这一系列特征的稳定存在，为地球生命形式提供了各种存活条件，确保了地球生命体系可以经历漫长的进化岁月，孕育出人类来。人类是地球生命体系中首创以社会方式存在的物种，使人类的社会存在与其他生物物种的存在方式表现出明显的特异性来。人类不仅源自地球生命体系，是地球生命体系的产物，同时还必须寄生于地球生命体系之中。这种寄生性，一方面表现为与其他生物物种一样，需要在地球生命体系内进行生命物质、生物能与信息的交换；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正由于人类及其社会的发展与壮大，地球生命体系才开始蒙受来自内部的有意识干预。鉴于这种干预具有可积累的倾向，且各种并存的有意识干预还会相互叠加，才最终导致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一系列生态隐忧，地球生命体系局部受损，并以生态蜕变或生态灾变的形式频繁地表现出来。

由于地球及其生命体系的规模极其庞大，因而目前已经露头的生态灾变，对于地球生命体系而言，虽然尚未构成致命性的摧残，但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却已经严重地阻碍了发展的进程。与地球生命体系相比，人类社会的规模要小得多，因而，人类社会对与自身密切相关的那部分生态系统的变迁，必然表现得非常敏感。目前，地球生命体系的局部缺损与灾变，在特定的层面及其范围内，已经构成了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于是“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等术语随之成为当代人们的热门话题。这样的话语背景，正是生态人类学的催产素。

与“人类的危机”、“发展的末日”、“地球生命体系会被人类毁灭”、“人类最后来到地球，却将要最先离开地球”这些悲观论调相比，我们既不轻视与掩盖“危机”，也不惧怕这类“危机”。这是因为我们既看到了人类的过去与现在，又看到了人类社会的无比丰富性，还注意到在发展的道路上人类具有多重选择的余地，因此，深信人类社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有能力化解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灾变。人类只要能动地调适其发展取向，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依然可以海阔天空。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地球生命体系具有超凡的自组织能力，对其顽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同样深信不疑。地质学家告诉我们，在经历了地质史上多次的灭顶之灾后，地球生命体系不仅能全面地恢复过来，而且能发展得更具活力。

我们的立场来自我们独特的视角。当代的文化人类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几乎同时注意到，某些重大变故的发生其孕育的时间长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而变故所波及的范围又会远远超出变化的现场。重大变故发生的原因，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都可能远离现场。而且，导致重大变故的成因往往不止一个，而是多重因果关系复合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重大变故酿成的后果也非止一端，而是会并行诱发出多重不同的后果来。正是这种新的认识激活了生态学家，他们提出了对生态系统的分析需要作“超大尺度”的分析，也就是摆脱先辈们对具体种群、具体生态群落的研究。文化人类学家也开始力图摆脱前辈们单就小社区、单一民族研究的范式，开始致力于社会合运动分析。随着环境科学家发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呼声以来，世人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环境的破坏具有广泛的牵连性，环境的维护需要全世界协调一致的行动。生态问题的复杂性，早已突破了文艺复兴以来单凭实验室数据下结论的研究范式，迫使研究者必须从更大的时空场域去观察问题，必须注意到多重因果关系的复合并存及其综合作用结果的模糊性、难以预测性。

基于问题的复杂性，生态人类学着手探讨生态问题时，自然需要从“超大尺度”上去审视人类社会与地球生命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探求人类社会与地球生命体系相互兼容与并行发展的各种可能。所谓“超大尺度”，是指在始终保持研究对象体系完整的规模上展开观察与分析，不允许人为化简或抽出某些构成要素去代表该体系。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其他专门学科不



同。从“超大尺度”上观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去认识“生态危机”的实质，是我们独特的立论公设之一。

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刚性单元，而是一个具有自组织能力的自为体系。在其内部有着不同的层次结构，不同的层次内还有众多的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又包含着若干构成要素。在这一点上，他与地球生命体系的构造方式十分相似，两者都属于自为体系。正如生物学中是以物种作为研究的单元一样，生态人类学理当继承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传统，以人类社会中的各个民族及其文化作为研究的单元，以便和生态学家的研究对接，推动文化人类学与生态学的有效结合。在一个民族中，其社会成员的行为，包括其生态行为，都处于相关文化的规约之下，因而，必然具有一致性和相互协调性。基于文化在人类社会建构中的这种独特性和重要性，我们将文化选定为我们研究的基点。这也与其他学科不同，当然也容易遭到其他学科的责难，但我们却毫不动摇。因为抛开了文化，人类社会的体系特征就难以把握，并容易掩盖人类存在的实质。从文化去认识人类社会，进而认识人类社会与地球生命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我们的立论公设之二。

生物学家在描述共时态的生命行为时，启用了—个关键的术语：自组织性。而在描述历时态的生命现象时，又启用了—个关键性的术语：进化。综合这两个术语后，不难看出，它们都是生命行为的两个表现侧面。即，保持生命体系和创新生命体系。保持与创新都源自于生命的本能，这种本能正体现为自己对自己的建构的保持与创新，完全是一种自为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聚合与运行的存在方式，因而，需要启用一个新的术语去总括其特性，这个术语即“自为体系”。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建构源自于生物学，文化的进化概念一直支配着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建设。与此同时，文化人类学的前辈也注意到了文化具有自我维持和自我组织社会生活的功能。从历时的角度看，文化也在不断创新。总之，文化也具有生命现象的各种属性，文化维系的社会个人与生物体—样，也应当是自为体系。

—切自为体系都是物质、能量与信息—的特殊存在方式，特殊之处在于构成自为体系的物质与能量不是随机的拼合，也不是按耗散规律作单一的耗散运行，而是在其特有信息系统的节制下，物质与能量都作有序的运行，并依



赖这种有序性建构起一个个具有内聚能力的物质与能量实体。这样的实体，同样靠特有信息的节制，可以保持稳态延续，可以不断壮大，可以不断地创新。为了全面地概括物质、能量与信息的这种特殊存在形式，需要启用一个新的术语，即“制衡”。制衡包含三项内容，一是制衡存在之物质与能量的有序聚合并作稳态延续；二是制衡运行，指在特有信息的节制下，物质与能量作有序运行，以确保自为体系获得内聚能力并保持不断壮大的趋势；三是制衡创新，指节制制衡运行和制衡聚合的信息系统可以不断改写、复制和创新，从而造就新的自为体系单元，并使整个自为体系日趋层次化、多样化和复杂化。以自为体系的制衡存在、运行与创新为认识框架去探讨人类社会的生态安全问题，是生态人类学的立论公设之三。

我们目前尚无法证明上述立论公设是否合理，令人信服的证明得由哲学家们去完成。我们坚信这三个公设的合理性，主要出自于对文化人类学与生态学一个多世纪以来研究经验的总结。这两门学科都是从观察基本单元的整体外观特征及其延续状态入手，描述此类基本单元的形态，比较其间的区别与联系，以便提供整套的识别办法，进而探讨此类基本单元之间的结构与功能，确认其间的相互依存和制约关系，并最终形成了文化的整体观和生态系统的整体观。到20世纪中期，文化人类学提出了“文化生态”理念，生态学提出了生态系统生态学。两门学科的发展历程同时表明：对自为体系必须作整体性的研究，不应当轻率地套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去推测自为体系的运行和延续特性。

我们的自信源于我们对自为体系各构成单元之间及各自为体系之间制衡关系的清醒认识。我们注意到一切自为体系都具有层次结构。民族分野是人类社会下的并存子系统，正如各自然生态系统是地球生命体系下的并存子系统一样，子系统之下还有更多的层次和并存的次级小系统。并存自为体系之间，有限构成要素的平衡并不能代表其间关系的全部内容，相关自为体系之间的制衡才具有说明其实质的能力。当代文化人类学与生态学立足于对自为体系的探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并对制衡概念的基本内涵达成了初步的共识。凭借对制衡稳态延续条件的分析去认知人类社会与地球生命体系，同样是合理的而且是可行的。我们坚信只要从这三个公设出发，我们对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的认识，必将获得新的突破。



围绕自为体系制衡延续和非对称反馈等概念去揭示生态问题的实质，并不是我们在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在对比、归纳不同学科的有关术语后，发现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已经隐含了上述概念的基本内容。启用这些新的术语，最多不过是在前人启发下得到的感悟罢了。

参考书目：

1. 黄鼎成、王毅、康晓光著．人与自然关系导论．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2. 曾维华、程声通著．环境灾害学引论．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
3. [美] 玛格纳著，李难、崔极谦、王水平译．生命科学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4. [英] A.J. 麦克迈克尔著，罗蕾、王晓红译．危险的地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5. [英] J.L. 蒙特思主编，卢其尧、江广恒、高亮之等译．植被与大气原理．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6. S.L. 朱勒、L.E. 奥吉尔著，彭奕欣译．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
7. [美] 戴森著，李笃中译．全方位的无限：生命为什么如此复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8. 杨槐著．地问——关于地球的千古之谜与地学创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9. 刘国城、晁连成、张忠伦、叶平著．生物圈与人类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10. 武汉地质学院古生物教研室编．古生物学基础．北京：地质出版社，1983
11. 丁圣彦主编．生态学——面向人类生存环境的科学价值观．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第二章 人类种群与人类社群

人类种群——人类社群——人类社会的双重性——偏离——生命信息——人为信息——生物性进化——社会性进化——自然选择——社会选择——生态行为——生态后果

人类是地球生命体系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其特殊性在于他的存在方式具有两重性。若单就生物性而言，人类与其他生物物种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差异，人类仅是一个普通的生物物种，所有人类的个体构成了人类的种群。但若就人类的社会性而言，人类却是地球生命体系中唯一具有复杂社会结构的生物物种，它肯定是地球生命体系中一个独特的社会性生物物种，从社会个人到人类社会之间，人们可以凭借不同的文化聚合成层次各别的人群。这与其他生物物种显然不同。然而不管处在哪个层次的人群，都无一例外地同时兼备生物性与社会性两个侧面，这就是人类社会建构的双重性。为此，当我们强调其生物性时，应将个人聚合体称之为“人类种群”，当我们强调其社会性时，则理应称之为“人类社群”。

人类种群的生命延续形式就其生物性而言，与其他生物物种并无二致，它同样需要在地球生命体系内进行生命物质、生物能与信息的交换；其个体的生命也有特定的周期，其生育繁衍同样不能逾越种间隔离的界限。然而，由于个人的生命运行可以得到社会合力的支持，人类种群的生存与延续，在如下三个方面又表现得与其他生物物种迥然不同。

其一，人类种群是当代陆上生态系统中，最具生态扩张能力的动物种群。与其他生物物种相比，人类种群在地球生命体系中拥有极为广阔的食物来源，是地球上生态位最不明显的动物种群。他能凭借社会的合力对食物的来源作出能动的选择，并能做深度加工，还能超长期地贮存食物等等。并以